值得关注的“灵活经济”

马志刚

新观察

近期，“灵活经济”成了理论界和不少国外媒体关注、讨论的一个焦点。

“灵活经济”是相对“灵活就业”而言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这里的“灵活就业”与传统所说的小商小贩或保姆等灵活就业大不一样。据报道，在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崛起一支独立的劳动大军，他们主动放弃了全职工作，要么自己创办企业，要么作为合同工承包一个项目，为的是能独立工作、自己管控自己的生活。而按以往经验，灵活就业者的出现，大多是被动的，或者源于企业裁员，或者源于劳动者本身找不到更稳定的工作。

“灵活经济”现象的出现，打破了过去那种只为固定公司工作、然后退休养老的雇主关系，正在成为重塑成千上万人生产生活乃至工业生产模式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美国一家大型调研公司预测，今后3年美国灵活就业劳动力有望增长30%，而且这种高增速会持续很长时间，一个理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寻找灵活的劳动力，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新一代劳动者也希望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在我国，“灵活经济”也在发展。比较典型的如宅访问。一些人借助互联网收集信息，并按要求对信息进行加工分析，以帮助客户作出决策。这是一份很灵活的工作，但绝不是“傻瓜型”的简单劳动，做一个高级的宅访问者需要相当强的专业知识。不止宅访问，我国每年都有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不找工作，而是在家里搞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设计游戏、研发软件、做自媒体等，成为“创客”，这些灵活就业者有望成为我国“灵活经济”的先行者。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快到来，使得“灵活经济”崛起更加可能。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基础，大权掌握在少数工业巨头手中。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分散式和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将取代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传统生产方式，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使得人人都能成为生产者，人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厂。而像阿里巴巴和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更强调服务、平台化，日益成为重要的平台和服务提供者。与此同时，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腾飞，使得劳动者和企业能更便捷地找到对方。

探讨“灵活经济”，是因为它有可能对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的参与者。“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这一苗头性现象值得各行各业重视。

切实提高大都市圈发展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来明

前瞻

大都市圈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其区位发展优势突出，完全具备成长为世界级大都市圈的潜力。当然，我国大都市圈发展还面临许多现实难题，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顶层设计，着眼长远，循序推进

（一）

包括都市在内的城市，作为一大文明成果，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寄托着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现实梦想。应该说，从城市出现的那一刻起，到城市里生活，成为城里人，就是人们孜孜不倦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据悉，最早出现的城市距离今天已有万年之久。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城市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王冠上的宝石。在我国古代，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城市，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繁华程度上看，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城市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以及城市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是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工业化从根本上重塑了城市的内涵和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起步则比西方工业化国家晚了100多年，工业化落伍是中国现代城市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回顾全球的城市发展历史，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历史，并且要找出一个词来概括城市的本质特征，在我看来，是“聚集”。如果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词，那么我会选择“组织化”。我以为，这两个词既能够解释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所在，也能够解释城市为人诟病之处。从聚集的角度看，正是通过人口以及人类活动在城市这个相对狭小空间的聚集，人们才可以享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带来的各种正收益，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仅对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具有积极意义，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和供给成本的降低、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合理化同样也具有积极影响。

甘蔗没有两头甜。同时，也正是因为聚集，人们不得不承受交通拥堵、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超负荷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城市发展来讲，仅仅做到规模上、数量上、范围上的聚集还不够，城市还需要良好的组织。无论是在不同产业之间、在社会各部门之间，还是在空间形态和内在功能上，都需要良好的组织。有了良好的组织，可以减少城市因为人口及其各类活动聚集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良好的组织，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得不到有效解决，还会不断加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这两方面都有切身的感受。

（二）

从一个个城市到一个个大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也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大都市圈中，聚集和组织已经超出了单一城市的人口、产业、社会活动和治理的范畴，而是以不同规模、不同特点、不同功能的城市为单位在更大空间和更深层次的融合式进行。正如城市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动力和活力一样，大都市圈则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和优化了国家各类资源，推动国家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上升到新水平。

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了多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巨型都市圈，包括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圈、五大湖都市圈；日本的东京都市圈；英国的伦敦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地区等；除此之外，荷兰的兰斯塔德都市圈、德国的莱茵—鲁尔都市圈等也很著名。这些都市圈以一个或若干个大城市为核心，形成了经济和社会活动活跃、功能互补性强的空间圈层结构，成为所属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中心和竞争高地，并较大程度地缓解了单一城市人口、资源与人类活动过度聚集而导致的各类城市病。

中国永远要做一个学习大国。这同样受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发展上。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是后来者，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有借鉴意义。虽然我国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理气候、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各国人民追求美好城市生活的愿望是相同的。具体而言，人们都希望大都市圈在创造物质繁荣的同时，能够更加兼顾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社会的公平正义、城市治理的井井有条，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形成和成长、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城市对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有客观规律可依循。向这方面的先进国家学习得对、学习得好，我们就可以少花代价、少走弯路。

（三）

在过去30多年里，我国经历了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3.73%。考虑到我国的人口规模，我们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正是基于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3个超大规模的都市圈，此外还形成了大大小小10余个规模相对较小的都市圈。在这三大都市圈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上亿人口。这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所在区域90%以上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区位发展优势，具备成长为世界级大都市圈的潜力。

从世界级大都市圈发展的要求来看，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既面临一些现实难题，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就难题而言，不仅表现为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恶化，也表现为行政手段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预和约束，以及当前发展阶段所设定的资金、人力、技术、经验、管理等因素限制，这一切都对城镇化进程管理和大都市圈治理形成了较大的约束。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从制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并突出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各项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在财政、土地、户籍、人口、社会保障、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制度突破，都有利于大都市圈发展。其次，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虽然目前我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压力，但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正在主动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切无疑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无疑会为新型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第三，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改善，为大都市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硬件和软件支撑。第四，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和树立起科学发展理念，加强了同国外的相关经验交流，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认识，这为我们提高大都市圈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种有利因素和现实难题，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大都市圈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各方面坚持不懈地付出艰辛努力。我们要发扬钉钉子精神，稳扎稳打地推进大都市圈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科学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既要让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各类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和组合，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也需要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完善顶层设计，着眼长远，克服各种市场失灵，着重做好大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交通为切入点完善支撑都市圈发展的基础设施体系，通过制度改革打破行政边界对资源要素流动的阻隔。

理论在线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

范垄基 穆月英

“三农”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对于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深入发展，农业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以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新型农业主体经营规模较大，资金需求增加，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这一问题制约了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较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金融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偏少，金融功能配置存在缺位、错位问题，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力度、广度有待提升，金融服务相对供给不足，整体服务水平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亟待继续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以服务现代农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宽思路、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构建功能健全、结构合理、竞争充分、优势互补、深度覆盖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力度，更好地满足“三农”金融服务需求。

第一，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农村金融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市场产品，还带有准公共性质，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如何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是摆在农村金融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过程中，要搞好两个结合，一个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相结合；一个是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经济增长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分类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的优势和商业银行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形成支持“三农”的合力。其次，要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不仅要充分发挥农村现有各类金融机构的优势，还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未来将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农业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组建主要服务“三农”的金融租赁公司；鼓励组建政府出资为主、重点开展涉农担保业务的县域融资性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支持其他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此外，还要规范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积极稳妥组织试点，抓紧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在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从而更好地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第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当前，农村资金需求日益多样化，在央行和银监会的鼓励和支持下，涉农金融机构也随之展开了包括林权抵押贷款、小额信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方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但在多数农村地区，农村金融产品单一、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还应当继续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在具体实践中，要积极推动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颁证、登记、流转等基础性工作，探索开展“三权”抵押试点；用足用好农村有限担保资源，允许法律法规不禁止、产权归属清晰、价值评估合理的各类农村资产设置抵押；鼓励推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动态调整”的农户信贷模式，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放款进度和回收期限；加快微贷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业务，创新和推广专营机构、信贷工厂等服务模式；进一步简化金融服务手续，推行通俗易懂的合同文本，优化审批流程，规范服务收费，严禁在提供金融服务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和额外费用，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第三，加快农村金融服务立法。目前，我国有关农村金融的法律规范散见于相关的金融法律之中，尚无专门针对支持农业农村的金融机构的法律，客观上削弱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法律保障。应加快农村金融服务立法步伐，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成熟的政策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形成金融支农长效机制。比如，应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对新型合作金融制度的基本内涵、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主要特征、发展环境、扶持政策等作出法律规定；为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组建和后续发展提供行政管理依据；对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具体内容、配套政策等作出规定等。

与此同时，要让金融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还要在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政策、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完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农村，反哺“三农”。加快建立导向明确、激励有效、约束严格、协调配套的长期化、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金融机构开展“三农”业务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调动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风险管控，不断加强涉农贷款的风险管理，认真落实贷款“三查”制度，进一步提高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加强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和连续性。此外，开展农村地区金融知识宣传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要通过走街道、下乡村、进厂企、访社区等多种形式，在农村地区宣传普及金融知识，让农村群众“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服务农民对金融的实际需求，从而真正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现代农业的质量。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群众利益无小事

尚志强

群众路线大家谈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指针。在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紧紧围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狠抓思想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群众路线，始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入细致体察民情、真情实意关注民生、立行立改反映民意，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存在的“四风”问题，受到了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认可。

深入细致体察民情。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真开门、开大门，听民声、察民意”大调研行动，要求党员干部在调研走访中严于律己、轻车简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拉近与基层群众的距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全旗65名县级干部带领108个工作组、300多个小分队、3167名党员干部，深入农村牧区、城镇社区和工矿企业，调研走访城乡居民5万户、13.5万人。在调研走访中做到了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同时，还将调研走访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及时了解掌握了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积极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帮助理清发展思路。调研中共征集到各类意见建议7873条，建立起300多页涉及基层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实际困难和问题的民情台账，获取了服务群众的第一手资料。调研结束后，旗委通过制定出台“三到两强”服务制度（工作到村、服务到户、温暖到心，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以基层干部为重点的党员队伍建设），将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真情实意关注民生。站在群众的立场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就要以人民群众为根本，关切民生保障和改善。我们在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在动员引导全旗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了解、体察民情的基础上，切实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为民谋利作为第一责任，把关心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启动实施“三联六助”暖民心工程，即通过县级、科级和普通党员干部三级纵向联动、横向联合，实实在在帮助农牧民解决危房改造、安全饮水、户户通电通广播电视、扶困助学、创业就业、养老保险大病救助等6个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立行立改反映民意。从活动一开始我们就坚持什么问题突出、什么问题紧急、什么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我们就先行整改什么问题。比如，针对群众反映信访渠道不畅、反映问题难、解决速度慢的问题。我们及时成立旗信访接待大厅，每周安排2位县级干部在旗信访接待大厅坐班接访。同时，建立旗、苏木镇、嘎查村（社区）和民情收集员四级干部接访制度并严格执行，有效打通了联系服务信访群众“最后一公里”。又比如，在基层调研走访中了解到，群众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难、多头跑、时间长等问题。我们通过将4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70多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全部集中到旗政务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理，大力简化办事流程、向群众公开机关单位权力运行清单，做到了为民服务事项公开、透明、限时、高效办结，大大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

“群众利益无小事”，既是我们做好群众工作应有的最基本的态度，也是我们党员干部应该牢记的大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不能含糊，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唯有如此，才能增进党员干部与群众的感情，党和政府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从而积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内蒙古鄂托克旗委书记）

寻找“新常态”下的解决之道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国际税务峰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并就经济发展形势、企业兼并重组、全球税务最新趋势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在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要更注重技术能力的获得和提升，海外并购重点可考虑从过去以获得自然资源为主转向转型升级要素的获得为主。另一方面，这种“新常态”对财税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复杂，财税政策需要直面这些挑战，进行相应调整，从而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杨 澍）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24.75元 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宣广0044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21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50 印完时间：4:20 本报印刷厂印刷